

# 百年沧桑与辉煌

## ——简述中国基础英语教育史

刘道义

**【摘要】** 中国的英语教学始于西方在华的教会学校。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御侮图存不得已发起洋务运动。1862年，同文馆的建立标志我国学校英语教育的开始。1912年至1949年，中国政局多变，战乱不断。民国初期，新兴产业阶层产生，新兴知识阶层出现，社会政治与经济变革催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给教育带来了教育观念的变革。一战以后，仿日学制受到批判，1922年教育部正式发布仿美学制“新学制”。1923年制订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标志着我国现代教育的开始。民国时期虽然局势动荡，但重视英语，是我国英语教育发展的重要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76年，我国的英语教育走过了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一直到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美恢复外交关系以后，英语教育越来越受到了重视。1977年以来，我国英语教育积极执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在近40年持续不断地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关键词】** 京师同文馆；早期发展；迂回前行；改革开放；振兴繁荣；矛盾和问题

DOI:10.13527/b.cnki.educ.sci.china.2015.04.005

早在19世纪初，西方国家的一些传教士就在中国沿海一带进行传教活动，设立了学校，教授英语。例如，1807年第一个来华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于1818年在马六甲开设了一所英华学校，后又在广州、香港设立学校。19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在广州、澳门开办马礼逊学堂<sup>①</sup>。由于清王朝曾下令禁教，教会学校规模极小，1840年在华的传教士仅有20人，学生数十人。两次鸦片战争的大炮轰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冲破了外国人在华传教的限令。1858年以后，传教士成批涌入，

---

<sup>①</sup> 王凌皓主编：《中国教育史纲要》（第二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页。

1889年增至1 296人。1962年京师同文馆开办以前,中国的英语教学仅限在十多所教会学校进行,分布在五个通商口岸——上海、广州、宁波、福州和厦门<sup>①</sup>。

1962年,清政府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了同文馆,开始了我国英语教育的先河。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英语教育历经沧桑与辉煌,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清末(1862—1911)、民国(1912—1949)、新中国(上)(1949—1976)、新中国(下)(1977年至今)。

## 一、第一阶段 清末(1862—1911)——被迫启动

19世纪后期,中国进入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时期。清王朝的部分精英阶层真切感到历史的大变局,不得不兴起一场自强改革的洋务运动。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林则徐就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魏源提出了“师夷”是为了“制夷”的主张。60年代以后,恭亲王奕訢,地方大员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存,维护清朝统治,以强兵富国为目的,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策略,创办学堂、派遣留学、编练新军、发展工矿商业等事业。从此,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经历了“西学东渐”的过程。英语教育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 (一) 京师同文馆

1861年,奕訢等上奏:“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已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李鸿章也强调培养译员的重要性:“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述,亦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为应付频繁的外交事务,清咸丰皇帝于1861年正式批准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并于1862年6月开办京师同文馆。同文馆虽说是一所初等外语学校,却是我国学校英语教学的正式开端。

同文馆先开设英文馆,后增设法、俄、德、日文馆。学生从八旗中挑选“资质聪慧,现习清文,年在15岁上下”的,由初期10—30名,到1887年增至120名。同文馆除了外文,另设天文、算学、医学、生理学、史地、理化等学科。学制为8年。开办时只有2名教师(当时称教习)。英文教习是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汉文教习是徐澍琳(暗负有“稽查”的任务)。任教时间最长的是丁韪良(W. A. P. Martin),为总教习,即校长,达30多年。教授英文的多半是洋教习,所用教材大都是英文原版课本,

<sup>①</sup>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编著:《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38页。

除了课堂教学,学生也参与一些语言翻译实践活动。同文馆的考试有四种:月考(称为“月课”)、季考、岁考和大考(每三年一次总考试)。1878年同文馆大考中获得第一名的汪凤藻翻译的《英文文法举隅》一书,被后人誉为中国第一本英文文法书。

京师同文馆自1862年创办至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前后共40年。在整个过程中不断遭到反对洋务的顽固派的攻击与阻挠,学员多为官宦子弟,安于微利,不求上进。为数不多的略有名气的毕业生还主要来自上海和广州同文馆。京师同文馆后期内部腐败严重,曾有官员上奏,揭露其种种腐败现象,如“考课不真”考试作弊;“奖赏不实”,学校官员克扣银两;“馆规不严”,“学生酗酒、赌博、荡检逾闲”。这说明,在不触动反动腐败的封建王朝统治下,同文馆要办成真正新式的学校是不可能的,但是,同文馆毕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时代产物,其课程不仅设有语言文字翻译,还兼学实用科学,这在当时是一大进步。

上海同文馆和广州同文馆分别于1863年和1864年成立。上海同文馆后改名为上海广方言馆,1869年并入江南制造局,1905年改为工业学堂。广州同文馆于1905年改为广州译学馆,成为五年制的高等学堂。这两所同文馆地处通商口岸,规模虽小,办学却有特色,都为京师同文馆咨送过数十名优秀学生。汪凤藻就是由上海同文馆咨送到北京的。除了上海、广州,其他地方也开办过一些外国语言学堂,如台湾西学馆和湖北自强学堂等。<sup>①</sup>

## (二) 兴办其他洋务学堂

清末时期,洋务派共创办了30余所学堂。京师同文馆等属于外语学堂,此外还有科技学堂(如福州船政学堂)和军事学堂(如江南水师学堂),全都属于官办。这些学堂分布较广,除去通商口岸,有天津、南京、武昌、威海、旅顺、烟台、杭州、贵阳、安庆、太原、台北、西安,还有四川、甘肃、河南等省。

洋务学堂是在与顽固势力、守旧思想的论争中发展起来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866年底至1867年上半年的围绕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的争论与斗争,最终以恭亲王奕訢为代表的洋务派取胜,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守旧派失败而告终。

洋务学堂大多属于中高等专业教育或技术教育,课程内容和设置主要是外语、数理化、外国史地法律、西方科技与军事知识。洋务学堂普遍采用了学年制、课程计划制、班级授课制以及规范的考试、毕业制度,而且重视实验、实习等实践教学。洋务学堂大都重视外语教学,有的学堂聘用外籍教员,直接用英文讲授西学科目。

福州船政学堂是洋务学堂中成效与影响较大的一所,也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工程技术类专门学校。船政学堂分前学堂、后学堂,学制各5年。成绩优异的毕业

<sup>①</sup>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编著:《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9—52页。

生,送往法、英等国留学,就是著名的船政学堂学生留欧活动<sup>①</sup>。这些学堂把外语教学与其他格致学科结合起来,造就了一批外文基础好又有扎实工艺知识的人才,日后成了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事业中有影响的人物。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教育家马建忠等都是福建船政学堂的毕业生。船政学堂还缔造了中国第一代现代海军将领,如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大部分军舰的管带都是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其中最著名的有邓世昌、刘步蟾等。

### (三) 留学教育

留学教育是清末洋务派“新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个提出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的是容闳。1847年,容闳随马礼逊学堂校长布朗赴美学习,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回国后,抱着“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使古老的中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的愿望,奔走于清廷洋务派官僚之间,终于获得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的认可。1871年,曾、李奏请同治皇帝批准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容闳在上海设立留美预备学堂,凡赴美幼童先入学堂学习中西文。1872年8月,第一批官费留学生30人由陈兰彬等率领赴美。接着,每年都派出30名学生,到1875年为止,共派出了120名。当时选拔学生遇到很大困难。由于对海外事物一无所知,绝大多数家庭不愿意让孩子去异国就读,只有沿海地区的家长比较开放,因此,70%的幼童出自广东省。

据耶鲁大学校长反映,赴美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致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闲言。”“凡此诸生言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定为贵国争荣誉也”。然而,1880年,美国出现了排华的倾向,清政府以陈兰彬为首的顽固派一直对留学教育持消极态度,这时更加从中作梗,不断向清廷打“报告”,历数留学之“弊病”,如参加宗教活动、体育及户外活动、衣冠穿戴模仿当地人,尤其是剪辫子被认为是大逆不忠。最后,1881年全部留美学生中断学业被召回国。虽然,他们起初颇受清政府的冷遇,但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清官员为“富国强兵”之需要,不得不陆续启用这批留洋知识分子。而这批学生多数热爱祖国,从事电报通讯、军事、机械、矿业、医务等工作,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首批赴美的詹天佑成为铁路工程师,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了京张铁路。第三批派出的唐绍仪成为民国第一任总理。还有梁敦彦任过外长,许多人被委派为驻外使馆人员<sup>②</sup>。

尽管幼童赴美留学未能圆满完成原定计划,却开创了中国学生官费出洋留学的

<sup>①</sup> 李剑萍、杨旭著:《中国现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16页。

<sup>②</sup> 刘道义、吴兆颐主编:《英语教育在中国:历史与现状》,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8页。

先例。

此后，洋务学堂开始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不仅派往美国，也派往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

兴办洋务学堂、派学生留洋等一系列重布新、慎除旧之举，都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教育指导思想<sup>①</sup>。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1898年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得到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封建官僚士绅们的认同。可是，“西学东渐”引进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等西方的物质文明，但“中学为体”强调封建的伦理纲常与君主统治的不可动摇，必然造成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

清王朝覆灭之前，1908年，美国政府承认签订“辛丑条约”时向中国索取的赔款过多，同意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以办学与派遣中国留学生留学美国之用。美国用此巧妙的方式企图“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sup>②</sup>。1909年至1911年，每年派遣100名学生留美。为训练赴美留学生，创办了游美肄业馆，训练学生。该馆于1911年4月26日改名为“清华学堂”。后来，清华大学的校庆定在每年4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日。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华学堂停办了半年后，又继续派遣学生留美事项。

#### （四）“新政”时期教育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外患不断，国内御侮图强的呼声高涨。早期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发起了具有爱国性质的维新运动。虽然，这场运动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只延续了103天，但体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中的进步思潮，其影响深远。光绪帝采纳了维新派的建议，废八股、变科考、办新学、组学社、设立农学会、创立翻译局及翻译学堂，出版书籍和报纸，提倡西学，发展实业，倡导女子教育，等等。“百日维新”虽以失败告终，但是其教育思想推进了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兴学热，创办了一些公立的中西学堂，如1897年在上海建立的“南洋公学”，设有师范院，实际上是我国最早的师范学校，也是培养第一批英文教师的学校。南洋公学还有外院、小学、中学和大学。教学方法较为先进，许多毕业生被保送欧美深造，因此学校倍受欢迎<sup>③</sup>。更重要的是，1905年清政府迫于各方压力下诏停止科考，从此结束了长达

<sup>①</sup> 陈学恂主编，田正平分卷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sup>②</sup> 引自A. H. Smith: China and America Today, 纽约, 1907年, 第13—218页。《中国英语教学史》，第129页。

<sup>③</sup> 陈景磐著：《中国近代教育史》（第三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页。

1 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和禁锢思想的僵死的八股文。

1902年,清政府委任张百熙等拟定了《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但未正式实行,第二年由张之洞等拟定了《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于1904年公布,自此开始了全国统用的新学制。新学制模仿了日本的学制,分初、中、高三段七级,长达20年。中学设外语科,课时多达每周6—10课时,约占总课时的四分之一。<sup>①</sup>

教学使用语法翻译法,教材多为引进的。1897年诞生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谢洪赉注译的《华英初阶》,这是我国第一本英语教科书,使用甚广。<sup>②</sup>据统计,到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外语书籍有400余种。1904年,伍光建编写的英文读本被公认为最佳。1906年学部设立图书编译局,令负责编审教科书,并公布审定的书目,于是有了“国定教科书”。

#### (五) 教会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教育主要有三种办学形式:传统的科举制书院和民间私塾,官办的新式学堂,外国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其中,教会学校发展最快、影响最大,办学效果也最好<sup>③</sup>。

教会教育实际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特殊产物。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教会学校逐渐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站稳了脚跟,并得到了发展。至70年代,教会学校已遍布沿海主要城市。1876年,据统计,由外国基督教开办的学校约有350所,学生人数近6000人,主要是小学。为了提高办学和教学质量,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于1877年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议题是,加强文化教育事业不应局限于小学教育和读圣经与学习基督教教义,而要培养一批具有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从而影响今后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会议决定成立基督教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仅13年就出版了3万册教科书及各种图表。1887年,教会又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出版机构“同文书会”(后称“广学会”)。1890年,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改“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为“中华教育会”(后改为“全国基督教教育会”)。这时教会学校数量增长很快,而且逐渐形成从幼儿园、小、中、大学的完整的教会教育系统。到1914年,美、英、德等国的基督教团体在中国开办的学校已达四千多所,学生总数113000多。这些学校广开英语课程,使英语取代汉语,制造一种全盘英语的气氛,使学生在校内如置身于英国、美国一样。教会学校这

<sup>①</sup> 唐立行著:《TEFL in China: Methods and technique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8—39页。

<sup>②</sup> 张英著:《启迪民智的钥匙》,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5页。

<sup>③</sup>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编著:《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86—94页。



么做完全是为了西方国家培养一大批懂英语的高层次文化人士以满足他们在华所办的企事业的需要。对此,清廷和后来的北洋军阀政府都不敢过问。事实上,当时所有教会开办的大学全在外国注册立案,根本不受中国政府法令的约束。

教会学校这种侵犯中国教育主权、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办学形式一直延续到1949年。不过,从教育史角度看,教会学校客观上也培养了一批有专长的学者、专家,如荣毅仁、丁光训、张伯苓等。我国中学也不乏毕业于教会学校的优秀英语教师,如应曼蓉、黄炳灵、王碧霖、董蔚君、郝又明等。他们回忆起在教会学校的学习经历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教会学校的许多成功的教学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可用于提高当代中国的英语教育质量,有效地培养高水平的外语人才,为振兴中华教育服务<sup>①</sup>。

## 二、第二阶段 民国(1912—1949)——早期发展

### (一) 民元教育与新文化运动(1912—1922)

1912年(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9日成立教育部,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1912年为壬子年,教育部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又颁布了《学校系统令》,称为“壬子学制”。暂行办法规定,学堂改为学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中学部分文实科等。蔡元培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和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宗旨。次年(1913年)为癸丑年,教育部组织制定壬子癸丑学制草案和各级校令。

这个新的学制草案仍然仿照日本学制,小学7年,初小为4年,高小为3年,小学高小有条件的可以在第3年开设外国语,每周3课时。中学4年,男生每周7—8课时,女生每周6课时。每周课时超过国文,可见当时对外语重视的程度。

中学校令试行规则要求:“外国语要旨在通解外国语普通语言文字,具有运用之能力,并增进知识。外国语首宜授以发音拼字,渐及简易文章之读法、书法、译解、默写,进授普通文章及文法要略、会话、作文。”<sup>②</sup> 中学第4年学生要学习外国文学要略。

英语教授方法,“注重预习,引导自动;多读勤作,随时练习会话以为实用之地;文法宜与读本联络,并注意记诵,以期捷径;提倡课外读书阅报……”<sup>③</sup>

① 黄炳灵:《素质教育与雅礼精神》,《英语教师》,2008年第3期。

② 陈侠著:《课程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5—68页。

③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编著:《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页。

1913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妄图复辟帝制,推行封建复古方针,但很快于1916年失败。1915至1922年,中国政坛最为混乱,军阀割据,政局多变。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工业得以快速发展。新兴城市增加,新兴产业阶层产生,新兴知识阶层出现。成千上万的留欧美与日本的学生归国,引进了民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唯物主义和早期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社会政治与经济变革催动了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当时的思想家、教育家批判尊孔读经,提倡科学和民主,开展教育改革,并倡导男女平等、采用国语和白话文等,形成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一战以后,随着反对列强的逼渗、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爆发了“五四运动”,又大大推动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给教育带来了教育观念的变革,集中体现为“两化三性”,即教育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实用性、民族性、国际性。<sup>①</sup>

教育民主化反映在尊重和发扬个性上,儿童本位主义开始流行。教育平民化,提出“惟民主义”教育方针<sup>②</sup>,发出了“劳工神圣”的呼声<sup>③</sup>。教育的科学化体现在科学内容的教学,科学方法的训练、科学精神的培养上。教育的实用性的理论基础之一是杜威的哲学观和教育观,主张培养实事求是的人才,不可专读死书,受书中思想的束缚和迷信前人的教条。

教育实用性的表现之一是职业教育的兴起。1916年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教育联合会指出,当时十分之九的中学毕业生因未受职业训练无自谋生活的能力,为此大家呼吁课程不应太划一,要加强职业技术训练。1917年,在黄炎培等人的推动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职业学校进行试验,从此职业教育得以发展。<sup>④</sup>中华职业教育社至今仍在积极开展活动。

教育的国际性主要指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更为频繁。政府和民间的交流密切,中方人员赴欧美考察教育,参加国际会议,邀请罗素、泰戈尔、杜威、孟禄等文化教育名人来华讲学。留学归国人员的影响力凸显,以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为代表的留欧美归国学者取代留日学生在教育界发挥引领的作用,因此,到欧美留学成为更多人的向往。最重要的是,人们具有开放的眼光,开始从全球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来审视和思考中国教育的问题。就在那时,蔡元培就提出了“以西方文化输入东方”、“以东方文化传布西方”东西文化结合的观点,这完全否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指明了现代教育的方向。

① 李剑萍、杨旭著:《中国现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200页。

② 戚谢美、邵祖德著:《陈独秀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4页。

③ 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页。

④ 田正平、李笑贤著:《黄炎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教育的民族性主要反映在以反帝爱国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教育活动中,如出现了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整理国故、重读经典等,而且开始结合中国教育国情,探索借鉴中国教育思想和实践体系等。

在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冲击下,教育界批评清末以来仿照日本的学制“不管社会的需要,不管地方的情形,也不管学生的个性”“不胜其弊”。而且,小学时间过长,最后一年所学内容与初中一年级重复,而中学年限不够;普通中学4年文科实科不分,缺少职业技能训练,“造出一帮不能生活的人”。自1919年至1922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及各省教育会多次开会,讨论学制改革。期间,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被邀请,直接参与了学制改革的研讨。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学制会议,由蔡元培主持会议,制定新学制草案,经数次修改,于同年11月正式发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史称“新学制”,又称“壬戌学制”,仿照美国六、三、三学制,小学6年,初中和高中各3年。1923年制订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是我国第一次以现代教育科学为理论依据的、体系较为严整的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sup>①</sup>这标志着我国现代教育的开始,这个时期重视外语,又以英语为主,是我国英语教育发展的重要阶段。

## (二) 英语课程的发展与变化(1923—1949)

1923年颁布的新学制课程纲要初中和高中外国语(主要指英语)课程纲要规定,小学以不教外国语为原则,初、高中外语的学分高居首位,高中要求达到16分,初中36分,与国语并列或超过。初中学分占20%,即1/5的比重。当时实际教学中外语课多超过规定的课时,因此招致质疑。不少人认为,对于初中生不愿升学或升学有困难的来说,与其修满外语课学分,不如修习其他有关科目。

1928年5月,政府大学院(同年7月又改称为教育部)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对1922年学制的利弊得失进行总结,并通过了《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即“壬戌学制”。1929年8月正式颁布经修订的《中学暂行课程标准》。这个课程标准将初中的外语课学分降至20或30分,高中学分由16增至26。1932年,中学正式课程标准取消了学分制,改为时数单位制,中学生不得提前毕业。要求高中毕业能为升学建立良好的基础。1935年教育部发布的修正中学学生毕业会考规程规定,高中毕业成绩占40%,会考成绩占60%。各省中学会考成绩优秀的前几名可免试升入大学。

1936和1939年的课程标准,根据教育专家的意见稍有调整。专家们认为,国立编译馆已成立,西文学说译本已如汗牛充栋,不缺翻译人才;中学生毕业后升学十不及三四,其余绝少应用所学英语,建议将初中英语改为选修,减少课时;增加国语及本国史地科学时,加强本国文化学习。但高中英语仍为必修的主课,课时不减,并分

<sup>①</sup> 吕达著:《中国近代课程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310页,第430—444页。

甲组侧重理工,乙组侧重文科,课时有所增加。

1923至1948年中学英语课程的变化<sup>①</sup>

时间	课程标准	周课时	目 标	要 求
1923	新学制课程纲要 初级中学外国语 课程纲要	每周 6 课时	使学生能阅浅易的英文书报。 使学生能用英语作浅近的书札及短文。 使学生能操日用的英语。	识字 1 600— 1 700
	新学制课程纲要 高级中学公共 必修的外国语 课程纲要	每周 4 课时	养成学生欣赏优美文学之兴趣,增进其阅读 书报杂志等能力,如复述,分解、摘记,领 受,能自评其所讲所述之内容。 养成学生通常会话的优良习惯,练习其口 才,使其听讲均能晓畅,并使其能与外国人 谈论日常生活之事件,而不感言语上之困难。 鼓励学生自行表演的能力,使其能写日常应 用的简短信札,能作简明通顺的有兴趣的短 篇文字。(说明的,或辩论的,或描写的, 或记载的。) 使学生摘读有系统的文法纲要,或参考较为 详细的文法,授以修辞学和作文法的知识, 养成正确清顺的翻译作文能力。	未提词汇 要求
1929	初级中学英语 暂行课程标准	每周 5 课时	使学生练习运用切于日常生活的浅近英语。 使学生建立进修英语的良好基础。 使学生从英语方面发展他们的语言经验。 使学生从英语方面增加他们研究外语事物的 兴趣。	听熟和说 熟约 1 500 词
	高级中学普通 科英语暂行课 程标准	高一 5 课时 高二、三为 4 课时	使学生练习运用切于使用的普通英语。 使学生略见近代英文文学作品一斑。 使学生对于内容方面需要英语的专门学术建 立进修的良好基础。 使学生对于工具方面需要英语的专门学术开 辟进修的良好途径。 使学生从英语方面发展他们的语言经验。 使学生从英语方面增加他们研究外国文化的 兴趣。	约 4 000 字 (连初中 的 1 500 字 在内)

<sup>①</sup>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 外语卷 英语》,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6页。

续表

时间	课程标准	周课时	目 标	要 求
1932	初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	每周 5 课时	(同 1929 年初级中学英语暂行课程标准)	约 3 000 字
	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	每周 5 课时	(同 1929 年高级普通科英语暂行课程标准)	约 8 000 字 (连初中的 3 000 字)
1936	初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	每周 4 课时	(同 1929 年初级中学英语暂行课程标准)	约 3 000 字
	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	每周 5 课时, 高三甲组 5, 乙组 8	(同 1929 年高级普通科英语暂行课程标准)	约 8 000 字 (连初中的 3 000 字)
1941	初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	每周 3 课时	(同 1929 年初级中学英语暂行课程标准)	约 2 000 字
	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		(同 1929 年高级普通科英语暂行课程标准)	约 7 000 字 (连初中的 2 000 字)
1948	修正初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	每周 5 课时, 高三甲组 5, 乙组 6	练习运用切于日常生活之浅近英语。 建立进修英语之正确基础。 认识英美民族精神及风俗习惯。 启发学习西洋事物之兴趣。	约 2 000 字
	修正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	初一、二每周 3 课时, 初三 4 每周 5 小时	练习运用切于使用之普通英语。 就英文诗歌散文中增进其语文训练。 从英语方面增加其对于西方文化之兴趣。 从语文中认识英语国家风俗之大概。 从英美民族史迹记载中, 激发爱国思想及国际了解。	约 6 000 字 (连初中的 2 000 字)

事实上, 自 1912 年以来, 教育部颁布的中学课程并没有被各地认真执行过, 抗战期间局势动乱, 教学秩序不正常, 要执行统一的课程更是纸上谈兵。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 解放战争开始。国民党统治区各级各类学校未及恢复、整顿, 又因政局动乱而处于混乱之中。尽管如此, 1946 年教育部责令中央大学、西南联大两校师范学院, 以及西北、重庆两所师范学院, 同时另聘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绍钧等 40 余人修订课程标准。1948 年, 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修订的初、高中英语课程标准。由于新中国成立在即, 此文件未起作用。但是, 从史料角度看, 这两个课程标准也算

是民国期间30多年中学英语教学经验总结。<sup>①</sup>

### (三) 品种繁多的英语教材

1912年9月教育部公布《审查教科书规程》，1915年设立教科书编纂处，1923年撤销编纂处，另设图书审定处，两年后又改审定处为编审处，另设编译处。1937年教育行政委员会设立教科书审查委员会，并公布教材图书审查条例。上海各出版社根据课程标准争相编辑出版教材。

审查通过的初中英语教科书有：胡宪生等编著的《英语新学制初中读本文法合编》、《新学制初中英文法教科书》，沈斌等的《新中学英语教科书读本》，张士一的《初中直接法英语教科书》，周越然的《英语模范读本》、《现代英语初中教科书》，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读本》，林汉达的《英语标准读本》、《初中英语标准读本》，陆步青的《国民英语读本一、二册》，文幼章的《直接法英语读本》，赵廷为等的《新标准初中英语第一册》，王云五等的《综合英语读本》，李唯建的《初中英语读本1-4册》，薛俊才的《初中英语第一册》，赵廷为、戚叔含的《新标准初中英语第三册》。

审查通过的高中英语教科书有：朱友渔的《新中学教科书高级英语读本》、林天兰的《英文修词学》、王昌社的《新中学高级英文典》、苏州中学教员英文研究会编的《高中英文选》、林汉达和李儒勉分别编的《高中英语读本》。<sup>②</sup>

这其中以张士一、周越然、林语堂、林汉达的英语教科书影响最大。英语教材除了教科书，还出版了大量教学辅助读物和教学参考书，如学习法、语音、文法、作文、会话、修辞、翻译、字汇及各种辞典。林语堂的《开明英语文法》和 *Nesfield's English Grammar Series* 一直影响至今。抗战爆发后，教材供应不足，普遍形成书荒。许多地方甚至要学生抄书使用。1942年，出版单位由正中书局一家改由商务、中华、正中、世界、大东、文通联合供应才缓解了书荒的问题。

政府虽然力图控制教材的编审权，但由于政局动荡，局势混乱，教材使用始终失控。教会学校和大城市的一些学校根本不受教育行政机关的管束，但内地省份及农村学校多用部编教材。

### (四) 英语教学研究

五四以后，关于外语教学研究的活动逐渐增多，出版了一些教学法的图书和文章，如张士一的《英语职业教授法》、陆殿扬的《英语教学言论选集》、周越然的

<sup>①</sup>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编著：《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48—176页。

<sup>②</sup> 陈自鹏著：《中国中小学英语课程教材教法百年变革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157页。

《初级外国语科教学法》等。在抗战后期，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英语教学改进委员会。抗战胜利后，1948年，成立了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该研究会由张士一主编，创刊《英语学习》。这是我国第一本全国性的研究英语教学的学术刊物。

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英语教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宣传和推广直接教学法和开展教学调查两个方面。

早在20世纪20年代，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的张士一，会同文幼章、周越然、陆殿扬、邹韬奋等人热心宣传H. E. Palmer的直接教学法。他们主张先有耳、口练习时期，以句为单位，大量重复句型，后眼看（读）、手写；用英语教英语，不用母语，充分利用表演和使用视听教学设备，如留声机、无线电、幻灯、电影等；提倡情境教学；语法教学用螺旋法，先重实用、归纳，后归纳和演绎并用。为了推行直接法，他们编写了教材，并培训教师，搞教学实验。直接教学法宣传了20多年，影响很大，但是，此法照搬本族语的方法，忽视中国人学外语的特点，难以推广。<sup>①</sup>除了一些有外国人教学的学校，大多数学校仍然采用语法翻译法。不过，直接法的许多科学的理念还是为人们所采纳，至今仍在起作用。例如，“听说领先，读写跟上”的教学原则、句型教学、情景教学、语法教学中归纳与演绎并用、使用直观教具和电化教学技术等，都与直接法有密切的联系。

开展调查指的是1929—1930年进行的中学教学一般情况的调查和1932—1937年进行的英语阅读水平调查。前者调查北京、天津、湖北、安徽等省市的20多所学校的高中和13所学校的初中，内容有英文教学时数、拼写、默写、预习与教师讲解、教学与翻译练习、英语与国语授课、口头回答与作文等项目。后者调查9个省的高中71所学校。调查结果在1955年才整理成《九省高中默读测量》。同时还调查了大学学生的英语阅读水平。这是我国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外语水平测试。主持这次调查的是中央大学教授艾伟。他曾就读圣约翰大学，并赴美深造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调查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全靠自己动手，政府资助很少，纸张缺乏，印刷困难，交通阻塞。此项调查历时多年，直到1955年整理成文，完稿第二天艾伟即溘然长逝。这个报告刊于艾伟的专著《英语教学心理学》，1957年由台湾编译馆出版。<sup>②</sup>

从测试调查发现，江苏、浙江的成绩全部大于常模。河北、广东教会学校的成绩大于常模，其余多小于常模。全国教学水平差异极大。教会学校的水平高于一般学校，沿海大城市学校高于内地学校。总体上说，由于受教育的人数仅占20%，接受过中学正规教育的学生的英语水平还是理想的。这一点为众多著名学者的亲身经历所

① 李庭芴主编：《英语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311页。

② 周流溪主编：《中国中学英语教育百科全书》，东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第195页。

证明。<sup>①</sup>

教会学校英语测试有口语测试（包含听和说的测试）、词汇、阅读理解（有问答、多项选择、是非题等）、翻译、写作、文法造句和改错等题型，几乎包揽了现代测试的各种题型。一般高中也还比较重视应用能力的考查，要求学生写200字的短文，除了应用文，也要求写议论文、描述或说明文。但一般初中仅以考查字词和文法为主，致使学生侧重模仿与记忆。当时，缺乏规范的外语评价标准，试题设计的质量较低，题目往往偏难，对教学存在负面影响，教师为考试而教，学生为考试而学，考场作弊现象层出不穷，而教员“见若不见，闻若无闻”。针对此种问题，陶行知先生曾撰文谴责考试弊病“欺亲师”、“辱国体”、“害子孙”，质问“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斯风不振，教育之前途何堪设想？”<sup>②</sup>

#### （五）民国时期的留学教育

自1912年至1949年，我国学生赴欧美留学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现分述如下：<sup>③</sup>

1912—1927年，清华学堂改名清华学校（1928年又改名为清华大学），在此期间共输送了1100名毕业生留美。同时，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也计划资送留学生，但因一战后政府财政困难，仅选送了20名。

1927—1937年，北伐成功，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1933年颁订国外留学规程，取消了对自费出国的限制，出国人数大增，共有7786人出国留学，其中公费生不足800人。留学日本人数近一半。

1937—1945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出国人数锐减。总共有一千余人在英美留学，无人去日、德等敌对国。

1945—1949年，抗战胜利后，基本上出国留学的都是自费生，约有两千人。中英文教基金会留学公费生仅有148名，其中有学习英国文学的王佐良、白纯瑜。1946年录取的自费留学生中128名学习英文学科，如许国璋、周珏良、吴景荣等。大批留学生从事英语教育和教学的除了前面提到的英语教材编者和研究人员还有：朱光潜、吴宓、梁实秋、范存忠、叶公超、钱钟书、水天同、初大告、俞大纲、卞之琳、程镇球、李赋宁、刘世沐等。

民国期间的留学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出了一些大师级的人物，但也存在一些弊病，如政策时宽时紧，缺乏全盘计划；不乏有人重学位而忽视实际运用，甚至不顾一切出国混学位和绿卡；崇洋而忽视祖国文化等。

① 季美林主编：《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② 董宝良主编：《陶行知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③ 林子勋著：《中国留学教育史》，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481—188页。



### 三、第三阶段 新中国（上）（1949—1976）——迂回前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这一段历史时期，我国中小学的外语教育随着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与发展，走过了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动荡不定、起伏不断，犹如潮水时涨时落。张正东先生形象地称这个阶段为“东西跳动期”。<sup>①</sup>这28年可分三段叙述：新中国建国初期（1949—1958）、调整与发展（1958—1966）、“文化大革命”（1966—1976）。

#### （一）建国初期（1949—1958）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新的教育体制还来不及建立。教育部于1950年8月颁发《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1952年3月颁发《中学暂行规程（草案）》，规定初、高中均需设一种外国语——英语或俄语。由于当时全国兴起了一股“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对于语种设置特意指出：如有师资、教材等条件宜设置俄语，但已授英语之班级，仍继续授英语，不可中途变更，其不具备俄语条件的学校，也宜暂授英语。可见，领导部门是积极推行俄语教育的，英语只是在俄语不具备条件下也宜暂授。当年的教材由各地自行决定采用。英语有用新中国成立前的经过改编的教材，也有用地区自编的教材。<sup>②</sup>

1951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还印发了《普通中学英语科课程标准草案》，其中包括《初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草案》和《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草案》两大部分。初中英语教学要求学生认识1 000—1 500个常用词。高中英语教学的目的是：1. 养成阅读和练习英语的志趣，打下进修专科用的英语基础。2. 再加修3 000—4 000个一般通用的单字（连初中共约5 000字）。3. 能练习运用普通英语，包括简单的会话和写作。4. 能认识一种标音制（如国际音标或韦氏音标）。5. 能利用字典、词典，阅读一般性的英文书报杂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部首次颁布的英语课程标准，实际上没有很好地贯彻，当时中学生普遍不想学习英语而要求学俄语。<sup>③</sup>他们认为英语是帝国主义语言，学了无用。

教育部于1954年4月28日发布《关于从1954年秋季起中学外国语课设置的通知》明确指示：从1954年秋季起初中不开设外语课，高中开设外语课（从一年级起授俄语课）。初中不设外语课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减轻初中学生学习的过重负担，使

<sup>①</sup> 张正东著：《中国外语教学法理论与流派》，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sup>②</sup> 刘道义主编：《基础外语教育发展报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sup>③</sup> 戴炜栋、胡文仲主编：《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研究（1949—200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70页。

他们能更好地学好本国语文和其他学科；另外，初中师资水平不高，教学质量较低。对高中俄语师资不足的问题则鼓励其他学科，尤其是英语教师经自学或受训后转授俄语。这是第一次外语教师大转业——“英转俄”，解决了俄语师资不足的问题，稳定了外语师资队伍，但导致英俄语师资水平均不高。

实践证明，初中不开设外语课不利于学生的智力发展，有碍外语教学质量的提高。教育部于1956年7月10日发布了《关于中学外国语科的通知》，明文规定：“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必须扩大和加强中学外语的教学。各厅、局除注意改进俄语教学外，还必须注意扩大和改进英语教学。从1956年秋季起，凡英语师资条件较好的地区，从高中一年级起应增设英语课。”并规定，从1957年秋季起，初中一年级开始恢复外国语科。各地中学俄语和英语的比例暂定各为50%。教育部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外语教材。

与此同年，教育部颁布了《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草案）》。在这个大纲的“说明”里，确认了“外语的学习对于我们的年青一代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初中未开设外语，因此从语音起始，要求较低，高中三年每周4课时，毕业时仅要求学生学会1500个单词，获得必要的语法知识，并能应用这些知识进行造句、问答、翻译等练习。依据此大纲编写的《高级中学课本 英语》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全国范围内通用的首批自编的英语教材。编者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有周谟智、刘承沛、夏祖燊、王晋熙、吴千之等。

1957年6月，教育部颁发了《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草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初中英语教材。教育部仍然责成北京外国语学院编写教材，参与编写的有应曼蓉、范瑛、杨树勋、张冠林，并有初大告、刘世沐校订。

1958年，在政治挂帅，“一天等于二十年”和“赶英超美”大跃进的狂热风潮影响下，教育界掀起了“教育大革命”。1960年3月7日，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省市文教书记会议上，讲到北京师范大学研究了教学上少慢差费的原因，想搞九年一贯制，就是六岁入学，学九年，毕业时的程度达到大学一、二年级，并表示对这样的改革精神很支持。<sup>①</sup>于是，教育部委托北师大外语系编写教材，由人教社出版全套18册课本。师大本科生提前毕业，同教师一起编写九年一贯制英语课本。他们在一无大纲，二无参照课本的情况下，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展开一场通宵达旦的战斗，速战速决，从1960年2月底到3月8日，一周内完成。编者只能顺手牵羊，东拼西凑，来了一个“选—译—注”三位一体的编法。这套教材匆忙出炉后在和平门外北师大旧址图书馆展览了一番，前三册在个别学校试用，被证明内容突出政治，不符合语言

<sup>①</sup>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著：《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研究丛书 英语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教学规律，根本无法使用，整套课本变成了一堆废纸。

## （二）调整与发展（1959—1966）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共中央为扭转极左思潮，纠正“大跃进”所造成的错误，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sup>①</sup>“教育大革命”也随之结束，学校师生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开始强调发展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外语教育也受到了重视。

1959 年，教育部深感培养高级建设人才和科学技术人才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项迫切的重要任务，针对中学的外语教学情况，于 3 月 26 日下达了《关于在中学加强和开设外国语的通知》，提出了，一方面要加强高中外国语科的教学，另一方面要在大、中城市有条件的初中开设外国语科。使学生在中学就打好一种外国语的基础。为此，全日制中学拟分甲、乙两类：甲类教学要求较高，乙类教学要求较低。中学设置各种外国语的比例，大体上规定约有三分之一的学校教俄语，三分之二的学校教英语及其他外国语。各地根据以上精神对开设外国语的师资等问题做研究和准备。

1960 年 5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景山学校开始从小学一年级起教学外语的试验。同时，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外语学校和北京外国语学校先后建立，先从初中后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教授外语。1961 年 4 月，教育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设立外国语学校的初步意见，建议在几个大城市筹设外国语学校。同年 12 月，中宣部部长办公室会议决定，责成教育部提出方案尽早部署。1963 年 4 月，周恩来总理对教育部“关于筹备外国语学校问题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请教育部将高、中、小三级各语种衔接的安排，包括学校、班数、学生人数、教师、教材和教学计划，订出五年进度计划送阅。”同年 7 月，教育部又发出《关于开办外国语学校的通知》，得到了各地积极响应，到 1964 年全国开办了 11 所。至此，各类学校的外语教育呈现出令人欣喜的上升趋势。<sup>②</sup>

1960 年 10 月，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在陆定一直接领导下召开了全国中小学文教工作会议，会后成立中小学教材编审领导小组。为了满足十年制学校教学的需要，教育部决定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十年制中小学教材。1962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外语编辑室（包括英、俄语两个组），张志公任外语编辑室主任，应曼蓉任英语组组长，组员有冯伴琴、吴道存、唐钧、寿纪瑜、陈国芳、孔昭棣、刘平英、周礼芹。1963 年，教育部颁发《中小学全日制十二年制新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十二年制中学教材。当时英语教材的编制工作是在许国璋、刘世沐等

<sup>①</sup> 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1960 年 9 月 30 日发布。

<sup>②</sup> 刘道义：《探索培养高端外语人才之路》，《英语学习（教师版）》，2014 年第 8 期，第 20 页。

专家指导下,在总结建国前后经验教训、比较英、美、日、苏联的英语教材基础上进行的,并作了大量调查研究。这套十二年制学校的初中英语教材曾在北京景山学校试教,并从1963年秋季开学全国普遍使用,受到了好评。可惜好景不长,到1966年高中三册尚未出版,十年动乱开始,全套教材也就中途夭折了。

此时对外语教学的重视程度还体现在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中。从1958年起,高考恢复了外语考试,但考试成绩不作为正式分数,只作为录取新生时的参考。从1962年起高等学校录取新生时将外语考试的成绩作为正式分数。这一决策无疑促进了中学的外语教学。

应河北等六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要求,1962年7月30日教育部颁发了《对小学开设外国语科的有关问题的意见》,提出在条件较好的小学,可以在最后两个年级开设外语科。授课时数一般可按每周三课时安排。要挑选外语水平较好、发音正确的教师担任小学外语的教学工作,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在小学已学过外语的学生升入中学后,能够继续学习同一种外语,以免造成他们在学习外语方面的浪费。那时,我国部分大、中城市在个别基础较好的小学开设了外语。1963年教育部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再次强调学习外语的重要性,指出:外语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工具,应该大力加强外语课的教学,应该根据师资条件开设俄语或英语,逐步做到高中毕业生具有初步阅读外文书籍的能力。

世界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的恶化严重地影响了中学的外语教育。许多全日制中学改授英语课,俄语教师队伍不稳定,纷纷改教英语,出现了第二次外语教师大转业。“英转俄、俄转英”,使得中学外语教师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专业水平低下,严重地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高。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末。

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国务院外办、国务院文办、国家计委、高教部、教育部于1964年10月联合制定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了我国外语发展的方针:1.专业外语教育与公共外语教育并重;2.学校外语教育与业余外语教育并重;3.在学校外语教育中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大力调整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开设外语的语种比例;4.在大力发展语种数量、调整语种比例的同时,要特别注意保证外语教学质量。《纲要》对中学外语教育做出了规定:1.加强普通中学外语教育,开设英语和俄语;2.1970年以前要做到40%至50%的全日制初中学校和全部全日制高中学校开设外语;3.学习英语、俄语的学生比例要求先调整到1:1,1970年以后调整到2:1;4.要求高中毕业生一般能掌握3000个左右的单词,能阅读较浅近的外文书报,能进行简单的会话。<sup>①</sup>

<sup>①</sup> 付克著:《中国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 （三）“文化大革命”（1966—1976）

正当中小学出现了外语教育生机之时，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外语教育遭受了灭顶之灾。在十年浩劫期间，外语教育战线是重灾区，其破坏程度空前绝后。“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横扫一切，势如破竹。所有的学校一律停课，不少外语教师，就是因为他们教的是外语，被带上“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帽子而倍受冲击。有的饱受皮肉之苦，身心受辱。继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又以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幌子，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后17年普通教育的工作成绩，打着“教育革命”的旗号，大批“智育第一”、“师道尊严”、“读书无用论”，“外语特殊论”，致使外语教学陷入了一片混乱。1967年10月，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外语学科的“复课闹革命”，只是学学毛主席语录，唱唱革命歌曲。

然而，在1972年和1975年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外语教育开始受到重视，不少省、市、自治区相继编写了中小学教材。特别在我国恢复加入联合国和中美恢复外交关系以后，政治形势的发展对外语产生了迫切的需要。1972年，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国务院口头发布了毛主席“外语还是从小学学起好”的语录，我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小学开设外语课的热潮。小学不但开设英语课，有些学校还开设了日、俄、法、德、阿等其他语种。不过，当时中小学所使用的教材片面强调突出政治，质量低下，很难帮助学生有效地学好外语。

## 四、第四阶段 新中国（下）（1977年至今）——振兴繁荣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sup>①</sup>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正是改革开放的政策，才使英语学科受到了空前的重视，使英语教学在过去38年里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 （一）改革开放形势下英语教育的初步发展

#### 1. 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稳定教学秩序

1977年秋季，教育部从18个省、市、自治区选借了两百名大中小学教师（包括十多位英语教师），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形式，于9月起开始编写教学

<sup>①</sup> 周立平、钟灏主编：《邓小平论教育思想概述》，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大纲和教材。为了能在1978年提供新编教材以逐步替换“文革”期间各地编写的充斥政治口号、质量低下的教材，会议要求各学科迅速编出教学大纲和教材。

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指示：“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sup>①</sup>1978年1月，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规定中学和小学学制各为5年。教育部领导重视外语，主张从小学三年级起开设外语到高中共8年。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英语组于1978年代教育部制订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草案）》。1980年，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修订了大纲，进一步消除了“文革”的影响，产生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试行草案）》。

1978和1980年的英语教学大纲的教学目的与要求基本相同。教学目的是：“对学生进行听、说、读、写、译各方面的基本训练，一般侧重培养阅读和自学的能力，为进一步学习和运用英语打好基础。”教学要求规定：从初中一年级起始学习英语的学生要求掌握2200个左右单词和一定数量的惯用词组，从小学三年级起学习英语的学生要求掌握2800个左右单词和一定数量的惯用词组，两部分学生分别要能借助词典阅读一般题材的浅易或中等难度的读物，具有初步或一定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sup>②</sup>根据大纲，教材编写组编制了小学英语6册，初中英语6册，高中英语2册。

根据大纲编写的中小学英语教材在实施的过程中，编写组不断征求各地意见，发现实施难度大。原因有三：教学时间少而教学内容偏多偏难；师资水平低；教学条件差。1981年4月教育部修订了教学计划，由十年制改为十二年制，小学6年，中学6年，恢复了六三三学制。为了解决初中师资奇缺与小学英语教学质量低下的问题，全国大部分地区小学外语下马，仅有上海、广州和无锡三市继续坚持。有条件开设英语的小学仅在最后两年开设。人教社外语编辑室将小学英语教科书由6册减成4册，供小学最后两年使用。

1981年，教育部发布了《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并责成人教社草拟了《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试行草案）》<sup>③</sup>，编写了初中6册、高中3册英语课本（试用本），要求切实在中学打好英语基础。大纲要求从初中一年级起始学习6年，词汇量需达到2700—3000。这个大纲与教材原本应限于重点学校实施，但实际上为全国所有学校通用，于是引起了强烈反响，认为“深、难、

① 邓小平：《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②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外语卷·英语》，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135，140—155页。

③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研究丛书 英语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63—375页。



重”。结果，这份大纲仅仅在1982年第4期中小学外语教学上发表征求意见，没有正式颁布。教育部于1985年发出了《关于印发调整初中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四科教学要求意见的通知》，要求从实际出发调整要求，以减轻学生的负担。同时，教育部组织力量调整、修订了教学大纲。

这就形成了1986年的《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其框架结构与1978和1980年的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没有小学部分，但是1986年大纲增加了《全日制中学高中一年级起始英语课的教学目的、要求和安排》，附上了中学要求掌握的2 000词汇表。与以往的大纲相比，1986年的教学大纲的目的要求更为符合实际、更为科学，特别是词汇表的制定是在分析16个中外英语词表基础上完成的。教学原则部分明确提出，遵循语言教学规律，寓思想教育于语言教学之中，初次提出精讲语言基础知识，着重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综合训练，阶段侧重；课堂教学尽量使用英语，适当使用母语；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等具有改革思想的教学原则。

此时，人教社外语室英语组修订了初中、高中课本，并且编写了一套供高中起始的6册英语课本。这套教材为初中学得不好的学生提供了机会，很多学生到了高中，明确了学习目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重新开始学习三年也能以较好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当时的中小学英语课本全国通用。人教社参考了许多由国外引进的英语教科书，采用的是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句型教学路子编写。这一时期教材的特点是：重视英语基础语音、语法和词汇知识的传授和运用英语技能的训练；采取句型操练和语法知识归纳相结合的方法；重视模仿、记忆，以便提高语言的准确性；注意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特点，进行英汉语之间的比较；图文并茂，利于进行直观教学。

1990年，国家教委了解到当时许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初中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不少学科的内容仍然偏多，教学要求偏高，因此对中学语文、数学、外语等8科教学计划和大纲提出了调整意见，印发了《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的调整意见》，要求将普通高中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部分，英语学科的课时有所减少。1990年的《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教学要求略低于1986年的大纲。大纲规定的高中必修课要求是必修课教学、教学评估、会考的依据，高中选修课要求则是选修课教学、教学评估、高考命题的依据。此大纲规定，高中二年级（必修）与高中起始学三年的学生应学会1 800词，高中学三年的学生要求学会2 000词。依据此大纲培养出来的高中生进入高等院校已有英语的基础，从此结束了大学英语必须从ABC学起的状况。

1978至1990年共有4个英语教学大纲，前两个大纲包括小学英语，后两个仅为中学英语大纲。后两个中学英语教学大纲教学要求有所调整，但教材基本没变，仅削减了量。这一阶段的中学英语教学大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自始至终完整实施了

的大纲,其使用结束的时间是1998年秋,即最后一批使用根据这一阶段的教学大纲编写的高三教材的学生毕业。20世纪80年代的教学大纲与教材,对纠正不顾外语教学规律突出政治的错误倾向,稳定教学秩序,逐步提高英语教学质量功不可没。

## 2. 三次外语工作会议,推动英语教学改革

改革开放的形势迫切需要大批外语人才,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先后于1978、1982、1986年召开过三次全国外语工作会议。<sup>①</sup>这是有史以来少有的事,可见当时中央对外语教育重视的程度。

1978年8月28日至9月1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外语教育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加强外语教育、提高外语教育水平,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培养外语人才的办法和措施。同时,还就外语师资队伍建设、教材编写、电化教学、科学研究等方面的规划进行了讨论。1979年3月29日,教育部向各地发出了关于印发《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各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研究执行<sup>②</sup>。

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是,明确了外语教育的重要性。会议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迫切 need 加强外语教育,培养又红又专的外语人才。高水平的外语教育也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先进国家、先进民族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因此,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外语教育的领导,努力创造外语教学条件,迅速改变外语教育的封闭状态,努力在三五年内改变外语教育的落后面貌,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贡献。会议要求中小学千方百计地提高外语教育质量,切实抓好中小学外语教育这个基础。中学外语课和语文、数学等课程一样,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应当受到重视。

1978年的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由教育部组织召开的专题研究我国外语教育的会议,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它吹响了外语教育改革的号角。自此,外语教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纵深发展。

1982年5月27日至6月3日,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外语教育工作会议,7月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学外语教育的意见》<sup>③</sup>。会议首先肯定了自1978年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但指出中学外语教学水平低、质量差,分析了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1.明确中学外语教育的要求,从实际出发,区别要求,讲求实效,积极创造

<sup>①</sup> 刘道义主编:《基础外语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8)》,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9—18,23页。

<sup>②③</sup>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外语卷·英语》,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56页。

条件,努力提高质量,有计划地逐步发展。2. 语种设置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打算。从全国范围来说,以英语为主,俄语应占一定比例,有师资条件的学校,可根据需要适当开设日语。3. 建立一支合格的师资队伍。4. 加强教材建设,改进教学方法。会议还要求积极改善外语教学条件,切实办好外国语学校。

1985年5月,国家教委高教一司与中学教育司联合组织开展了全国15个省市中学英语教学调查研究工作,历时一年零七个月,调查选定了105所重点中学和35所普通中学的5.8万名学生一千多名教师。这在当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科调查。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以华东师大为基地,24所师范院校、教育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和省市教研部门配合,采用了科学的测试和现代化数据处理方法,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了调查工作。调查表明,中学外语水平近年来有明显的提高。经测算,重点高中学生掌握的英语词汇量由1984年的1600多个,增加到1986年1800多个,即每年以100个左右的词汇量递增。存在的问题是,中学生的英语水平低下,语言运用能力较差。<sup>①</sup>这次调研也为第三次全国外语工作会议和下一步课改作了准备。

第三次是由国家教委组织的全国中学外语教育改革座谈会,于1986年10月在大连召开。会议发布了《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学外语教学的几点意见》:明确工作方针,端正教学思想。方针是:立足当前,着眼未来;区分层次,分类指导;讲求实效,保证质量;英语为主,兼设其他语种,分期分批地提高中学外语教学水平。外语教学要学以致用,有了听说读写能力才能为四化建设服务,学生运用外语的能力是检验教学质量的主要尺度。会议重申了师资队伍建设、加强教学科研、改进教学方法等要求。

三次全国外语工作会议不仅提高了外语学科在教育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确了外语学科改革的方向与措施,推动了外语教育发展的进程。

### 3. 高考政策的变化与考试改革

引起社会重视外语教育的另一个因素是高考政策的变化。1977年恢复高考,但仅要求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参加外语考试。1978年起,所有考生都可参加外语考试,成绩不计入总分。1979年高考的外语成绩仅按10%计入总分,1980—1982年分别按30%、50%、70%计入总分,1983年起则按100%计入总分。现在,外语被列为必考的学科之一,受到了全社会史无前例的重视。

1989年全国开始进行高考标准化的改革试验。30多年来,为了帮助高校公平地选拔优秀人才,推进中学素质教育,高考一直不停地进行改革,英语测试重点逐渐由语言知识变为语言运用能力,单词或单句层次试题逐渐向篇章层次试题过渡,越来越重视所提供语言材料和测试任务的真实性,以便使高考对英语教学产生积极的反拨

<sup>①</sup> 左焕琪著:《全国中学英语教学调查与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

作用。

## (二) 20 世纪末英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 1. 义务教育法颁布，英语学科第一轮课改启动

面对 1985 年中学英语教学调查研究所指出的问题，教研人员急切探寻新的教学路子，对改革英语教学的呼声很高。而与此同时，开放的形势引进了大量语言学理论和外语教学法，其中对我国英语教学影响最大的有，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等为理论基础的听说法、口语法、结构法或句型法等。还有以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的功能法、交际法、意念法等。并且，引进了很多外国英语教材，如《情景英语》（Situational English），《看、听、学》（Look, Listen and Learn），《新活用英语》（New Active English），《英语 900 句》（English 900），《新概念英语》（New Concept English），《跟我学》（Follow Me）等。<sup>①</sup> 这些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开了思路，产生了强烈的改革愿望。这就为义务教育教学大纲及与其衔接的高中英语教学大纲的研制提供了基础。

1985 年 5 月，中央公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国家教委制定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学计划。1986 年 4 月 12 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启动了第一轮课改，首先展开九年义务教育教学大纲的研制工作，90 年代初接着又研制了高中英语教学大纲。这个阶段的教学大纲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与时俱进，在已取得的成绩基础上，有了较大的进步和较多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八个字上：“科学、规范、开放、完整”。<sup>②</sup>

大纲编写者把大纲的编制和实施看作是一个研究和实验的项目。他们认真学习和借鉴了外国及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课程研究资料，特别吸取了欧洲共同体国家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研究的成果，引进了交际语言教学的思想。在制定大纲的过程中，注意对实际教学的观察、调查、测量，注意定性定量的分析，编写者反复征求一线教研人员的意见。尤其对于教学的要求与教学原则的制定，都非常慎重，唯恐做出脱离我国实际的决定。较之 80 年代初期的大纲设计，明显的进步在于更加开放，更为科学化、民主化了。比较规范，主要是指从调研、编制到大纲的实施、试验、评价、审查、试用、再评价到修订等一系列的环节中，有自上而下的领导，由下而上的发动，组织有序，逐步滚动推进。比较完整，则指高中英语单科编制了 1993 年的教学大纲（初审

① 张志公、刘道义：《中学英语教材的现状与未来》，《张志公文集（五）》，广东教育出版社 1986 出版，第 23 页。

② 刘道义主编：《基础外语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8）》，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7—94 页。

稿),与义务教育初中教学大纲的衔接,保证了中学英语课程改革的完整、顺利进行。遗憾的是缺少对小学英语课程的研制。

## 2. “一纲多本”初见端倪

1988年在山东泰安召开的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教育部提出了“在统一基本要求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有计划有组织地编写中小学教材推进课程改革。根据上述精神,上海市着手自己制订课程标准,编写适应我国沿海开放城市及经济发达地区学校使用的教材,从1988年成立了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改革委员会,开始了改革中小学课程教材的跨世纪工程。

为了满足各地不同的需要,国家教委鼓励根据大纲编写不同的教材。1993年全国试用的初中英语教材有人教版(全国大部分地区使用)、上海版(上海市使用)、广东版(主要在广东和福建部分地区使用)、北师大版(在山东少数地区使用)和四川版(四川少数地区用)。这标志着中学英语教材“一纲多本”的开始。

为了加强教材建设工作的领导和管理,1983年,教育部决定成立中小学教材办公室。1986年9月,成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负责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材审查审定工作。1988年1月,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初审稿)》,并依此大纲编写不同版本的教材。1992年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试用)》。1993年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教材在全国投入试用。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教材(Junior English for China,简称JEFC)是人教社与英国朗文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合作编写而成的,1990年在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实验。考虑到1993年初中实验班将要升入高中,而义教初中英语教学课时减少,大纲和教材带来的教学路子变化较大,为了解决初、高中衔接问题,1991年1月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召开高中英语教学大纲研讨会,单独启动与初中衔接的高中英语教学大纲的设计工作。1993年5月,《全日制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初审稿)》由国家教委审定通过。1992年,人教社与英方继续合作编写高中英语教材(Senior English for China,简称SEFC),1993年秋供应中英合编的初中英语教材七个实验地区的高中使用。1996年,随着各科与义教初中衔接的高中教学大纲设计,1993年高中英语教学大纲稍有修改,成为《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供试验用)》。全国各地(除上海市外)推广了中英合编的高中英语教材。

## 3. 中外合编英语教材,开创了新的教学途径

人教社与英国朗文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合编的初、高中英语教材这个项目,是根据我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达成的协议,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资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执行机构,中英合作完成的。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中外合作编写英



语教材。JEFC 和 SEFC 两套教材由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分别于 1993 年和 1996 年投入全国（除上海市外）使用。

中英合编的英语教材是以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教学路子编写的，既突出语言的功能，注意培养学生为交际运用语言的能力，同时又注意基础知识与技能的训练。有继承，也有创新。由于教学理念新、方法变化大，随着这套教材在全国的推广，教师培训、教研工作、教法探索、测试改革等各方面出现了新的变革。

具有改革思想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在教学上带来的突出变化是。

（1）打破单纯以语音和语法为主要脉络组织教学内容的框架，而是根据交际目的的需要，既考虑语言的功能意念和话题，也考虑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等因素，并使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在起始阶段就让学生开口说话，彼此用英语介绍，展现书中的主要人物，但同时仍然穿插字母教学和语音教学。SEFC 通过调查了解到学生的兴趣和需要，确定了 16 个话题。每个单元围绕一个话题开展听、说、读、写的活动。过去教材以语法句型结构为主线，而今结构与话题、功能交织在一起，用循环式编排语法项目（即同一个语法项目安排在不同的单元，逐渐加深），但保证语法结构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呈现。

（2）教学内容贴近现代生活，符合学生的需要，重视培养思想情感和提高文化素养。所确定的话题具有时代感、思想性、知识性和真实性，不再像过去的课本中大部分课文与现实社会相距甚远，学生背记课文却无法谈论现实生活中的话题。JEFC 考虑到初中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设计了一群中外学生同校学习的故事，书中人物富有个性，教材描述了他们在三年中的种种经历和成长，加上有录音、录像配合，生动活泼，引起学生极大的兴趣。教材中李雷、韩梅梅、吉姆等人物给学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成了使用过这套教材的 1980 后出生的青年的共同记忆。SEFC 和传统教材相同之处是注意寓思想教育于语言教学之中，所不同的是 SEFC 大部分语言材料反映的是当代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如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妇女权利、饮食卫生、航天技术等；这些材料渗透了思想情感的教育，同时生动地展示了中外文化的差异，可以增强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意识。还有一些课文对发展智力因素，如观察、注意、思维等有积极的影响。

（3）通过听、说、读、写的全面训练培养学生为交际初步运用英语的能力。JEFC 从视听说入手，听说比重比较大。听说训练主要通过课堂互动、语言呈现和操练、语音练习、听力练习和各种口头信息交流活动来完成。在发展听说能力的同时，逐步培养读写的能力。SEFC 仍然重视听说，每个单元都设有专项听力和口语训练。而且读、写教学也提倡与口语教学结合，开展问答、讨论、采访等活动。更重要的是中考和高考加上了听力测试，这样一来，学生重视听说训练，听说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为解决“聋哑”英语问题找到了突破口。高中英语侧重阅读，主要通过阅读课



文和补充阅读训练培养学生根据上下文猜测词义、抓住要点、理解文章内涵、吸取书面信息等阅读技能。写作练习有三类：巩固语言的笔头练习、有指导的写和自由写作。写作训练一般经过构思、写提纲、起草、校订、修改等步骤。

1999 年秋，实施初、高中英语大纲的第一批学生由高中毕业。西南师范大学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在国家教委基教司的指导下，联合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全国高中英语教学进行了调查<sup>①</sup>。参加调查测量的重点与非重点学校 87 所，学生达 15 937 人。调查结果说明，我国中学英语教学有了明显的进步。与 1985 年全国调查相比，水平普遍提高，地区差距缩小，听说能力有较大的提高。调查报告还指出，中学英语教学已在进行五种转变，即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主体，从知识型教学转向能力型教学，从机械型操练为主转向兼用言语活动，教学语言从汉语转向英语。

#### 4. 1997 年中学外语教学座谈会

20 世纪 90 年代中学英语教学改革力度较大，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有较大提高，特别是听说能力提高显著，但总体来说，英语教学质量仍然较低，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1996 年 6 月 28 日，李岚清副总理在一次外语教学座谈会上，肯定了华东师大附中张思中的教学方法，提出要加强外语教学方法的研究，提高中学外语教学水平，改变“费时较多，收效较低”的问题。为指导外语教学改革的健康发展，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于 1997 年 6 月 26 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学外语教学座谈会，10 月 14 日印发了《全国中学外语教学座谈会纪要》。会议肯定了外语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可喜成果，同时也指出，中学外语教学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还普遍存在重知识轻能力的现象；教学法的改革与研究还不够广泛，不够活跃，在实践中形成的一些流派彼此学习交流不够；外语师资队伍不稳定，教师的业务能力较弱，教学水平亟待提高。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出席了这次座谈会。他建议：研究外语教学要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展学术思想，集思广益，取长补短，相互促进，不搞论战，重在建设，重在实践，从实践中去总结成功的经验，形成科学的教学法。

在这次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地的教研部门、教科所、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校都积极开展起科研活动。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和教研工作研讨会，探讨外语课程改革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交流教研工作经验；组织教学观摩课和学生的能力或口语竞赛。全国从国外引进了功能法、交际教学思想、3P 教学法、五步教学法，国内除了张思中教学法，还涌现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立体教学法等英语教学法。

<sup>①</sup> 张正东、陈治安、李力主编：《英语教学的现状与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6—162 页。

### 5. 全国各地小学英语开设呈上升趋势

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大多数小学停开外语课,但是,改革开放的形势对英语教学水平要求越来越高,许多人认为,提高基础英语教育的水平必须从小学开始。到了8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小学自发地开设了英语课。在这种背景下,外语教学研究会在天津市召开了第一次小学英语教学研讨会。1991年5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制定了《小学英语教学与教材编写纲要》<sup>①</sup>,并与新加坡泛太平洋公司合作编写了小学英语教材,供全国大多数开设英语的小学使用。1992年以后,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小学英语教学研讨会,并进行了四次有关小学英语课程开设情况的全国性调查。20世纪末,全国小学英语开设面已达30个省、市、区,学生人数已近一千万,足见小学开设外语课的发展势头。<sup>②</sup>

### 6. 修订初、高中英语教学大纲

2000年,教育部已经启动了第二轮课程改革,同时将初、高中各科教学大纲做了进一步的修订,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sup>③</sup>。这两个大纲均吸取了21世纪初的英语课程标准的一些新的理念,但教学要求较低,中学6年仅要求学生掌握1950个词。人教社在修订高中英语教材时,根据实际教学的需要,不仅贯彻新课标的理念,而且适当提高了要求,让学生学习近3000个词,这样便可使高中教学与下一阶段课改的要求衔接起来,实现顺利的过渡。

## (三) 21世纪英语课程改革

### 1. 21世纪初的英语课程改革

1999年,教育部正式启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是“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中的重点项目,是基础教育改革的重大举措。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要“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随即教育部组织制定义务教育阶段课程计划,并研制新的义务教育阶段各学科的课程标准。

2001年6月,在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印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

<sup>①</sup>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研究丛书 英语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76—380页。

<sup>②</sup> 刘道义主编:《基础外语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8)》,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9—18,109,542—543页。

<sup>③</sup>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外国语卷·英语》,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72—642页。

行)》，纲要指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六项目标<sup>①</sup>。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突出特点是，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促进每个学生健康发展，培养良好品德，培养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

为了加速提高外语教学水平，教育部于2001年1月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决定把小学开设英语课程作为21世纪初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随文件还附发了《小学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文件要求各地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其基本目标是：2001年秋季开始，在全国城市和县城小学逐步开设英语课程；2002年秋季，乡镇所在地小学逐步开设英语课程。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起始年级一般定为三年级。此后，全国小学开设英语课程出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2001年7月，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义务教育 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简称《义务普高课标》），2003年又颁发了《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简称《普高课标》）。教育部决定从2001年秋季起，开始进行义务教育新课程试验推广工作。2004年秋季开始，山东、广东、宁夏和海南4省、自治区开始实验高中新课程。原计划于2010年以前，在有关省市自愿申请的基础上，由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逐年推进高中新课程，实际上到2012年才完成。

## 2. 英语课程标准的亮点

（1）明确了英语课程的性质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具有人文性，彻底扭转了外语学科仅具有工具性的片面看法。《义务普高课标》写明：“英语课程的学习，既是学生通过英语学习和实践活动，逐步掌握英语知识和技能，提高语言实际运用能力的过程；又是他们磨砺意志、陶冶情操、拓展视野、丰富生活经历、开发思维能力、发展个性和提高人文素养的过程。”<sup>②</sup>《普高课标》提出：“高中学生学习外语，一方面可以促进心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发展和综合人文素养的提高；另一方面，掌握一门国际通用语种可以为学习国外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和进行国际交往创造条件。开设英语课程有利于提高民族素质，有利于我国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sup>③</sup>可以看出，课标从民族素质教育的高度、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明确了外语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

（2）规定课程目标是通过英语学习使学生形成初步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并且

---

① 王湛著：《扎实推进素质教育，开创基础教育改革新局面》，《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全日制义务教育 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对形成这一能力的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描述性的九级目标要求。初中五级要求学生学会使用1 500—1 600个单词和200—300个习惯用语或固定搭配,课外阅读量达到15万字;高中八年级要求学生学会使用3 300个单词和400—500个习惯用语或固定搭配,课外阅读量达到30万字。教学要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

(3) 课程标准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观念,例如突出学生自主性学习、探究性学习、合作性学习,采用“任务型”活动、形成性评价、开发课程资源等。首先强调语言学习的实践性与应用性,倡导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感知、体验、实践、参与、探究和合作等方式进行学习,改变传统“读、译、背、记”的学习方法和“讲、析、译、测”的教学方法。这反映了知识观的重大变化。过去,许多人以为外语学习仅能培养记忆力,而难以培养思维和创造力。<sup>①</sup> 英语课程标准倡导学生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去实践,亲身参与和感受,发现和探究新的知识和经验,通过实践、体验、思维和创造,构建新的知识,并形成能力,充实丰富自己的经验。这样一来,就必然要求学生在真实而富有实际意义的任务活动中去学习、体验和运用语言知识,而且要求学生使用认知、调控、交际和资源等策略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还要学会在学习与评价中与人合作。新课标指导下的教学更加重视学习的过程和方式,乃至正确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这样的教学必然会使教师教学更加民主,学生学习更加自主,能学会如何学习,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

### 3. 教材管理体系改革

2001年,中小学教材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教育部出台了《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的文件。做出的规定主要有:中小学教材建设实行在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方针,国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单位、团体和个人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高质量、有特色的教材;编写的管理由原来的审批制改为立项核准制,核准的管理采取国家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两级管理;规定教材审查人员不得参与教材的编写等。

自2001年以来,为配合课程标准的试验,各地有数十个单位、出版社甚至个人编写英语教材,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小学英语教材约有30种,初中约有10种,高中有7种。英语教材真正实现了多样化。<sup>②</sup>

2011年,教育部在广泛征求意见、总结课程标准实施10年来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各家教材也作了相应的修订,于

<sup>①</sup> 黄远振著:《新课程英语教与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sup>②</sup> 刘道义主编:《基础外语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8)》,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36—541页。

2012 年将起点年级教材送教育部审查。经审查通过的教材,当年秋季开始投入使用。2013 年,全部教材审查完毕。目前,教育部正在组织有关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施情况的调研和修订的工作。

#### 4. 英语课程标准教材的特点

多种英语教材的竞争不仅促进了教材的编制质量,也促进了印制质量,英语教材普遍采用四色胶印,版面设计新颖,插图精美,面貌一新。这些教材的内容,结构体系、程度与分量、活动与任务的设计等,都力求符合学生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特点,能够激发其兴趣。教材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和现代社会生活,如友谊、旅游、语言、音乐、卫生、体育、文化、娱乐、节日等都易于引起学生的思想共鸣。语言材料富有时代的气息,话题范围广泛,视野开阔,注重学科融合,信息量大,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帮助他们增进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大部分教材都遵循“功能—结构—话题—任务”相结合的途径进行设计,不拘泥于一种方法。注意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科学地安排语言材料,以利于学生构建知识、提高技能;教学单元以话题为中心开展听说读写的活动,设置真实而生动的情景和“任务型”的活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使他们获取、处理和使用信息,用英语交流,提高用英语做事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可以获得和积累经验,使他们逐步形成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各家教科书出版社都配合主教材提供了教学参考资料、配套读物、多媒体教学资源,为教师灵活地、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拓展教学内容提供了条件。此外,教材还提供了质性评价样本和行为评价的方法,确保形成性评价贯穿教学过程。

#### 5. 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改革

自 1988 年以来,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围绕如何提高学生素质这个目标开展了中小学课程教材的跨世纪工程。课程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88 年到 1997 年称为第一期工程。第二阶段是 1998 年到 2008 年称为第二期工程。为了适应上海市改革开放对外语人才的需要,上海市教委于 2001 年制定了关于“上海市高中毕业生一门外语(英语)能力基本过关实施意见”,提出了“强化英语、试验双语、探索多语”的措施。从 2001 年开始逐步实施从小学一年级起始全面开设英语课;扩大学生英语阅读量,初中生阅读量至少为 30 万词,高中生阅读量累计 60 万词以上,外国语学校 and 外语特色学校的高中毕业生阅读量累计应达到 80 万词以上。高中毕业生累计掌握词汇量在 5 000 个左右,优秀者争取达到 6 000—7 000 个;初中毕业生至少掌握 3 000 个;小学毕业生至少掌握 1 000 个。此外,从 2001 年到 2010 年有计划地开展双语教学试验,积极创设条件在全市创建双语教学实验学校。在强化英语教学、开展双语教学试验的同时,探索其他语种的教学试验和第二外语的试验。



日、德、法等其他语种的教学试验已分期分批地在一些学校进行。<sup>①</sup>

#### (四) 教学生态环境改善

##### 1. 现代教学技术的运用

课程和教材改革改善了课堂语言环境,课上开展的交际性活动变封闭式课堂教学为开放式、互动式课堂教学,改善了课堂的人文环境。社会普遍重视英语,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信息、校园文化等无处不见英语。教学技术进步大大改善了外语教学环境,中小学“校校通”、校园网普遍推广,对薄弱地区英语教师备课、教研和交流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计算机的普遍使用和网络教学,使英语教学超越时空,创造出真实有趣的语言环境,虚拟教学与真实语言运用有机融合,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和效益;扩大了语言输入量,增加了教学容量,增强了教学深度,加速了语感的形成和语言的內化;数字技术的交互性促进了学生的反馈,扩大了语言输出的机会,给学生以成功的体验;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精神和探究的意识,促进他们现代信息技术能力的提高,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参与国际竞争。

有的出版社出版了网络教材,许多教材出版单位设置了网站,学生运用互联网可以自学,排除课堂上的紧张、焦虑的情绪,使学习个性化。教师利用网站帮助他们备课和开展教研活动。有些小学和初中英语教材特制了示范教学的光盘,并通过电视台播放“空中教室”,为外语教学薄弱地区的学校展示了优秀的课堂教学,弥补了英语师资力量不足的缺陷。有条件的地区使用网络教材,开始了微课、慕课和翻转课堂教学的实验。

##### 2. 师资队伍的建设

师资队伍的建设是中小学外语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改革开放38年来,各师范院校、外语院校、教育学院、广播电视大学、成人大学及中等师范学校等加强职前教育,并开办教师培训班,创造条件使在职教师通过脱产、半脱产等形式进修,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中小学英语教师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学历达标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据统计,中小学英语教师的数量增长很快。1992年初中学生人数为4000多万,英语教师为33万,高中生为700多万,教师有7.3万;2003年初中生为6618万,教师有53万,高中生为1964万,教师有15.8万。2011年初中生人数有所下降(5067万),但教师人数却稍有增加(54.52万);高中生为2454万,教师增至23万多。小学英语教师人数逐年递增,2003年16万,2010年33万,2011年近35万人,2013年近38万人。

<sup>①</sup> 朱浦著:《上海市中小学英语课程和教材改革》,《基础外语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8)》,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9、114—117页。



### 3. 教学方法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中学外语教师数量严重不足,专业水平偏低,教学法研究不够,教学效果不理想。根据1982年的《全国中学外语教育工作会议》“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改进教学方法”的指示,我国外语教学专家研究国内外教学法撰写了多部教学法专著<sup>①</sup>,如《英语教学法》<sup>②</sup>、《外语教学法》(应云天,1986)<sup>③</sup>、《英语教学方法与技巧》(唐力行,1983)<sup>④</sup>、《外语教育学》(张正东,1987)<sup>⑤</sup>(章兼中,1992)<sup>⑥</sup>、《交际法和中国英语教学》(胡鉴明,2002)<sup>⑦</sup>、《英语教学法教程》(王蔷,2006)<sup>⑧</sup>等。

大中小学教师及教研人员在围绕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实施改进教学方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积累了教学经验,并且根据中国国情摸索出了一些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华氏结构功能法”<sup>⑨</sup>、“16字教学法”<sup>⑩</sup>、“三位一体教学法”<sup>⑪</sup>、“外语立体化教学法”<sup>⑫</sup>、“课文整体教学法”<sup>⑬</sup>、“十字教学法”<sup>⑭</sup>“双重活动教学法”<sup>⑮</sup>、“四位一体教学法”<sup>⑯</sup>等。

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外语教师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面对挑战必须提升自己,发展自己。他们不仅要有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娴熟的专业基本技能,还要有明确的人生发展目标和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学习教育教学理论、研究教育教学方法,成为教育研究者。因此,英语教师参加科研的热情越来越高。

① 周流溪主编:《中国中学英语教育百科全书》,东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205页。

② 李庭芴主编:《英语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胡春洞主编:《英语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③ 应云天著:《外语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④ 唐力行著:《英语教学方法与技巧》,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⑤ 张正东著:《外语教育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⑥ 章兼中主编:《外语教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⑦ 胡鉴明著:《交际法和中国英语教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⑧ 王蔷主编:《英语教学法教程(A Course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⑨ 曾葡初主编:《华氏结构功能法:内涵、历程、与发展》,《探索中国基础外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06—215页。

⑩ 张思中著:《外语教学有捷径——中学外语十六字教学法》,《江西教育》2001年第6期。

⑪ 马承著:《英语三位一体教学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⑫ 张正东著:《外语立体化教学法》,《张正东英语教育自选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版,第180—202页。

⑬ 黄炳灵、金蒂、刘兆义著:《英语课文整体教学体系初探》,《课程·教材·教法》1988年第2期,15—17页。

⑭ 章兼中、俞红珍著:《英语教育心理学》,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⑮ 王才仁著:《我缘何倡导“双重活动教学法”》,《中小学外语教学》1998年第2期。

⑯ 全国英语“四位一体”教学法研究所编:《英语“四位一体”教学法综述》,《中国英语外语教师》2006年第4期。

此外,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简称“外专委会”)、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研究中心(简称“外研中心”)和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简称“外教研中心”)等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小学英语教材的出版社、多家英语报刊社,组织教研活动、教学评优、能力竞赛、培训教师、赞助科研和教师出国进修等,为改进英语教学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 4. 多种办学模式

灵活多样的办学模式为发展外语教育创造了优越的条件。20世纪60年代,教育部根据中宣部的指示同意在北京、上海等地建立的外国语学校,除了4所停办,80年代尚存7所(上海、长春、南京、四川、杭州、天津、武汉外国语学校)。这些外国语学校都发展成了各所在地区的“人才强校、学科强校、课程强校、制度强校”,成了当地外语教学的“领头羊”,起着外语教学示范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新建了60多所具有一定规模的外国语学校,这些外语学校努力贯彻“强化英语、试验双语、探索多语”的方针,培养掌握多种外语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外语学校的毕业生要求比较熟练地掌握所学外语,掌握4 000—5 000个单词,能进行一般社会生活会话。

同时,各地示范性学校近几年与外国学校合作,有的成立国际班,试验全英语教学,使得不少中学生在高考,甚至雅思、托福等测试中获得高分。由于社会普遍重视外语,具有外语特色的实验学校纷纷建立。这类学校主要是以英语作为学校的办学特色,可分为公办和民办两种。其中不少学校办学硬件较好、师资质量较高,尽管收费较高,学生生源不断。此外,各个城市建立了不计其数的民办外语培训学校或培训班,如新东方学校、“疯狂英语”等影响很大,对提高学生外语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5. 国际交流有所加强

20世纪90年代,中英合编英语教材项目结束了我国英语教育对外封闭的状况,自那以后,国际交流活动日趋频繁。世纪之交,中外合作编写英语教材已很普遍。英语国家专家与中方专家一起培训中小学英语教师。外专委会、外研中心和外教研中心曾多次召开过国际学术研讨会,并组织教师出国参加短期培训、考察或参加国际研讨会,也组织学生参加国际学生英语竞赛或能力测试。经过外专委会等学术团体和地区教育部门及学校的努力,我国基础英语教育界已与英、美、澳、加等国建立了联系,不断“请进来、送出去”进行学术交流,还建立了“姊妹校”,进行合作办学。

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人数与日俱增,起初以公派出国读研为主,后自费生和本科生增多。21世纪初以来,出国学习的学生人数过百万,其中大部分赴英语国家学习,而且多为自费生。例如2012年近40万,其中自费生有38万,比2011年增加

17.65%。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出国学生的年龄下降,中学生增多。<sup>①</sup>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生的英语水平有所提高。

## 五、结语

我国一百多年英语教育的历程迂回曲折,充满艰辛,但不断进步,近几十年更见辉煌。不过,基础英语教育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仍然令外语教育工作者不断反思,继续探究。

### (一) 怎样正确认识英语课程的性质与作用

相当长时期,外语课程仅被认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发展的工具,甚至仅当作个人谋生的工具,而忽视其对人的素质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才会产生“外语无用论”,才会出现教育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度做出初中取消外语课的决定。一个多世纪以来,英语教育时而受重视,时而受冷落,风风雨雨几经周折,总算在30多年期间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英语学科的性质和作用才得以明确。

现在,课程标准明确了外语课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性质,这是一大进步。工具性指学“做事”,而人文性指学“做人”。但如果将教育目标设定为“做事”,其人文性就难于体现<sup>②</sup>。有的学者认为,当前的英语课程标准把“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定位为核心目标,把情感态度、文化视野、学习策略等定位成附属项,这是与以人为本和育人培养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背道而驰的<sup>③</sup>。过分强调语言的工具性就会使得“外语教育把人文素质的内涵边缘化了”<sup>④</sup>。

英语作为外语属于人文学科。语言所传递的信息首先充满着情感教育的因素。情感是一个人对他所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对他所认识或所做的事情的内部态度的不同形式的体验。有些心理学家把情感分为道德感、美感和理智感。而这些正是当代立德树人的价值观所必备的基本素质。“富强、民族、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价值观恰恰渗透在英语课程标准和教材的话题之中。

英语作为外语课犹如一扇门窗,打开它能够让学生放眼世界,丰富人生经历,吸取多元文化,形成跨文化意识,培养国际视野,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发展创新能力。这个作用是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近几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

① Z. Q. Wang, Chinese Students Head Overseas at Younger Ages, China Daily, 2013. 8. 2.

② 龚亚夫:《论基础英语教育的多元目标——探寻英语教育的核心价值》。

③ 章兼中:《基础英语教育课程总目标是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吗》,《课程·教材·教法》2011年第3期。

④ 张正东:《我国英语教学的属性和内容》,《课程·教材·教法》2003年第5期。

放,国富民强,中华民族已摘掉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东亚病夫”等令人屈辱的帽子,今天已能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个历史的变迁过程中,英语作为外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英语课又好像是一把开启学生心智的钥匙。有人说,外语只能发展人的记忆能力,不能发展人的思维能力。这是一种偏见。英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和听说读写的教学在整个过程之中,无时不在提高学生的观察、注意、记忆、思维和想象等能力。记忆也是一种能力,指人们对经验反映的心理过程,其中包括识记、保持、再现与回忆。而思维是在表象、概念基础上进行的分析、综合、判断、类比、联想、推理、批判等认知活动。想象是用外语表达的一个必要因素。外语课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否定的。

### (二) 在中国这样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中,如何制定英语课的教学要求

由“一纲一本”变成“一纲多本”这也是进步,可是,一纲多本仍然是一个标准<sup>①</sup>。尽管提出了九级要求,可实际上,人们认定的是初中升高中的五级要求与高中升大学的八级要求,其他的级别形同虚设。结果,课程和教材的要求及教学内容与实际需要脱节。我国需要全体受教育者通过外语学习理解外国文化,具有跨文化交往的能力和视野,并不要求全体受教育者成为外语运用者<sup>②</sup>,不必也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具有运用所学语言的能力。然而,国家需要一大批具有很强外语能力的专业人才,不同地区实际教学中也有外语特长生,完全可以因材施教,对他们拔高要求,培养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这就要求课程多元化,加强选修课,测试评价机制也应多元化,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和潜能。在实际教学中也好分层教学,提高实效。

### (三) 英语热是否削弱了汉语和中华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英语的地位空前提升,不断升温。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对我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掌握英语对民族素质的提高和个人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这是英语热的根本原因。只要坚持改革开放,英语就不会降温。英语热是否影响了汉语教学,需要调查和实证。中小学乃至整个社会一向重视语文课,有充足的课时、好的师资与丰富的教学资源,因此语文教学条件优于英语教学。即使外国语学校也很重视语文课,由于汉语与英语相互交融,外语学得好的学生汉语一般也很好。如果学生对语文不够重视或不感兴趣,这得从语文教学本身找原因,需要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改革创新,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同时,近年来兴起的国际学校或国际班也应该特别注意加强汉语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教

① 张志远:《中国英语教学:在反思中前行》,《课程·教材·教法》2011年第1期。

② 鲁子问:《我国外语政策的社会发展视角反思》,《探索中国基础外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63—64页。

育,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爱国情怀的学生。

在当今形势下,英语与汉语两种语言的相互碰撞、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已是历史的必然。汉语曾借助英语创造了拼音文字,创建了汉语语法,现又建立孔子学院使汉语和汉文化走向世界。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的增强,汉语也会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与英语平等的地位,世界也会出现“汉语热”的<sup>①</sup>。正像季羨林先生所说,“我们不能只讲西化,不讲‘东化’。”“不能只重视‘西学东渐’而忽视‘东学西渐’。”“我们中国人不但能够拿来,也能够送去。”<sup>②</sup>

英语文化与汉语文化这两大世界强势语言文化只有相互学习、借鉴,交融在一起,才能对世界的和平和文化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英汉语文化需要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共同发展。英语和语文界的同仁们要改变互不联系的状况,携起手来,相互学习、交流,切实研究如何改革创新,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 (四) 英语课程怎样才能做到教育公平同时又能培养出高端人才

英语课是义务教育的必修科目,每个公民都可接受,做到“有教无类”并非难事。但是,很难使所有受教育者享有同等外语教育资源,因此实现英语教育均衡发展几乎不可能。在中国,60%以上的地区为山脉和沙漠所覆盖,散居着近一亿少数民族,而12亿人集中在东部肥沃的土地上,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外语又有自身的特点,对外语语言环境、师资、设备,甚至家长都有特殊要求,这无疑加剧了地区、学校和个体之间的差距。况且,乡村小学未学过英语的,还有上与未上过培训班的学生,到了初中不同水平的学生混班上课,很容易形成两极分化。

要解决外语教育公平,首先要保证人人接受一定程度的外语素养,理解和包容异国文化,并为进一步学习打好初步的基础,不必要求所有人达到较高的标准。第二应允许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分层教学,多级要求,使得绝大多数学生学有所成。第三允许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并进,采取多种办学模式培养有特长的学生,如设选修课、办国际班、特色外语学校等,使他们成为高质量、多语种的复合型外语人才。第四可探索中外合作办学,汲取国内外名校的先进经验,在国内创建中西合璧的高质量的学校,满足学生与家长对优质教学资源的需求,减少他们的教育投入,同时避免低龄学生出国学习的风险。

#### (五) 用什么方法培养学生语言运用能力最有效

有不少人认为,在中国环境下,中学不可能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只能传授知识为他们考试和升学打下基础。而另有些人则认为,语言学习主要靠模仿和实践,不必教语言知识。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语言不仅是一套形式和符号系统,语言还

<sup>①</sup> 牛道生著:《英语对中国的历史性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9页。

<sup>②</sup> 季羨林著:《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新浪博客,2005年10月21日。



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交际工具,而运用语言是人的一种潜在能力。忽视语言的运用,仅靠学些有关英语的语法知识是绝对培养不了语言能力的,“聋哑英语”就由此而生。然而,语言知识是语言能力的基础,以为强调语言能力就可以忽视语言知识的看法是不对的<sup>①</sup>。语法还要学,学语法不是为了了解某种理论体系,而是为了正确使用语言,还要保证其社会文化规范。

正确处理知识与能力的这对矛盾是个复杂的问题。中国人学英语比德国或法国人难得多,因为英语与汉语的差异性比同属拉丁语系的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大得多,况且,中国学生在纯粹母语环境中学习外语,班级大、课时少、师资水平低、教学条件有限。他们不能像侨居英语国家的华人学英语(作为二语)那么轻松。一百多年来,从国外引进的教学法无数,尤其是近期流行的交际法、任务型教学影响很大,但是,到了中国,特别到了中西部及农村,这些法往往“水土不服”,效果不佳。于是,中国学者创造了各种“土法”来接地气。这证明了一点:英语教学方法虽多,但无一种能适于所有语境下的所有的学生。必须针对学习目的,学生的年龄特征、个性、兴趣、动机、学习风格,以及教学环境和条件,灵活地使用不同的方法。例如,小学生主要靠耳濡目染的模仿,不爱听语法规则讲解,而升到中学后,就逐渐不满足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模仿了,他们已有较高的推理能力,要求了解规律,以便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由此可知,最有效的培养语言运用能力的途径,是教师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和创造适合学生需要的方法。这通常被人们称作“折中法”、“综合法”或“中间道路(The Middle Path)”。凭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一定会创造出有效的教学途径和方法,并推向世界的。

#### (六) 怎样能大面积迅速地提高英语教师的专业水平

提高英语教学水平,教师是关键。历史上“英转俄、俄转英”和大批非英语专业教师转教英语的做法,使得英语教师的专业水平长时间难以提高。虽然,目前全国有了“百万大军”,而且根据统计,绝大多数学历已达标,但实际上很多并非英语专业。在继续教育和骨干教师培训时,特别是初中以下的教师听全英语的授课尚感到困难。中西部和农村地区语言环境薄弱,教师几乎没有机会出国学习,或接触英语国家人士,由于自身的素质较低,听说能力差,教学过程中重语法,轻交流<sup>②</sup>。居然有的课上,师生对答如流,听课者却听不出他们在说哪种语言。这样的教师尽管努力也是在浪费学生的时间和精力。

因此,大面积迅速提高英语教师专业水平成了当前极为紧迫的任务。首先,高等

<sup>①</sup> 刘润清著:《对英语教学的反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

<sup>②</sup> 吴欣、杨晓青主编:《中国中小学英语教师现状调查与分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师范院校和外语院系培养师资的职前教育课程应改革,使之更加贴近中小学的教学需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使就职的教师能迅速理解和实施新课程。同时,各级教育部门组织和支持各种经资质认证的培训机构加强在职教师继续教育,开展多形式和多层次的培训,请来(中外)专家教学,或派出(外地或外国)学习,提高语言能力、理论修养、教学的实践和创新能力。

教育管理部门需要建立一套外语教师专业化标准和评价标准,使教师教育与培训更加规范有效。有计划地培训一批骨干教师,鼓励他们带领更多教师开展科研,例如建立“名师屋”等,可以收到大面积教师发展的效果。

今后,还要大力利用互联网创建网络化的社交平台,为教师在网络上开展培训、教学和教研活动,提高教师素质和教学质量。还要为教师建立提高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服务平台,帮助他们使用开发工具自主开发教学资源。同时,还要建立管理平台,帮助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管理所有的教师和学生的空间。

除此以外,英语教育和教学尚有很多其他问题,如怎样克服考试对教学的负面影响、小学设不设与何时设外语课的争论,以及在英语教学中如何处理语言与文化、结构与功能、母语与外语、归纳与演绎、听说教学与读写教学、语言的准确与流利、学生主体与教师指导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网络教学中实现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深度融合等。这些问题有待今后长期持续不断的探讨与研究。<sup>①</sup>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我国学校外语教学一路走来,历尽艰辛。中国虽已成世界上的外语大国,却难以称为外语强国。如果拿我国英语与别的非英语国家(如印度、新加坡、印尼等)的相比,就会发现我国的总体英语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与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所需要的英语水平相距甚远。展望未来,任重道远,但只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贯彻科学发展的思想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处理各种矛盾<sup>②</sup>,深化英语教育全面改革,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政府与民间上下齐努力,我国的英语教育定会在本世纪中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和经验,以奉献世界。

(责任编辑 付 蕾)

<sup>①</sup> 刘道义、吴兆颐主编: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Past and Present,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87 页。

<sup>②</sup> 陈琳著:《辩证实践外语教育途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 页。



**刘道义** 1938 年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60 年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后从事英语教学，从 1977 年 8 月起，出席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材会议，参加编写统编教材。1980 年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至 1986 年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应用语言学。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课程教材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曾参与教育部中学英语教学大纲的编订和教材审查工作。参加了 12 套小学、初中、高中英语课本和教学

参考书的编写和修订工作。主编有《著名英语特级教师教学艺术》、《模范英语强化阅读丛书》、《新高中英语教与学》等；著有《刘道义英语教育自选集》、《基础外语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8）》、《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研究丛书 英语卷》、《英语教育在中国：历史与现状》等著作，并撰写有关英语教育与教学的文章一百多篇。

---

### 《百年沧桑与辉煌——简述中国基础英语教育史》导读

- 第一阶段 清末（1862—1911）——被迫启动
- 第二阶段 民国（1912—1949）——早期发展
- 第三阶段 新中国（上）（1949—1976）——迂回前行
- 第四阶段 新中国（下）（1977 年至今）——振兴繁荣

改革开放形势下英语教育的初步发展

20 世纪末英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21 世纪英语课程改革

教学生态环境改善

- 结语

怎样正确认识英语课程的性质与教育目标？

在中国这样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中，如何制定英语课的教学要求？

英语热是否削弱了汉语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英语课程怎样才能做到教育公平同时又能培养出高端人才？

用什么方法培养学生语言运用能力最有效？

怎样能大面积迅速地提高英语教师的专业水平？

---

## School Spirit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School Development

——A Speech at the Backbone Member Training Class of the Research Group  
of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Lin Chongd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School spirit is accumulated in long-term practice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school groups, common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core content and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is the school spirit. School spirit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It plays a role through such mental mechanisms as infection, imitation, hint, conformity, acknowledgement, and strengthening, which include four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eriods: incubation period, integration period, internalization period and mature period. To optimize school spirit, the following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he style of teaching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breakthrough, and earnestly do a good job in teaching style; improve school rules and regulations, optimize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 strengthen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foster a positive school atmosphere; practically and effectively do a good job in class atmosphere; develop school spirit in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leaders should really take the lead with concentrate efforts, and finally, establish a three-dimensional education network of school, families and society.

**Key words:** school spirit;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development stage; optimization measures

## An Arduous Journey an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ver the Past Two Centuri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a’s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Liu Daoyi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 started with Christian missionary schools run by Westerners in China. After the two opium wars, the Qing Dynasty was forced to initiate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to learn modern science from foreign powers. In 1862, the establishment of Tongwenguan signified the beginning of school English educ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years 1912—1949, the country experienced social upheaval and continuous wars. Nevertheless, in the early years,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catalyzed by modern industrialists and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brought about a reform in educational concepts.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 in 1922,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sued the “New School System” that followed the American model instead of the Japanese model. The 1923 Curriculum Outlines for the New School System was a signal of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 For the next few decades,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had enjoyed a high status and qui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its development despite the unsteady political climate. From 1949 wh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to 1976 wh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ded, the journey of English curriculum development was full of ups and downs. However, after China resumed the legal seat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esum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USA, English saw an upsurge in schools. Thanks to the Reform and

Open Door Policy that the government put into force in 1978, remarkable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Key words:** early development; Reform and Open Door Policy; rejuvenation and prosperity;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 Value, Connotation and Practice of Life-oriented Classroom

Li Zhen

(*JiangsuXinhai Senior High School, Lianyungang Jiangsu 222006, China*)

**Abstract:** Life-oriented classroom is the regression of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the right way of obtaining knowledge, the absorption of humanism, the reflection of exam-oriented education, the display of life spirit, the building of life stage and the baptism of teaching mode. The connotation of life-oriented classroom includes six dimensions. Life is the position of life-oriented classroom.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potential is the value of life-oriented classroom.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knowledge, emotion, intention and behavior is the goal of the life-oriented classroom. "Teaching of life" i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life-oriented classroom. The life world, which is full of breath of life, is the teaching resource of life-oriented classroom. The way of implementing life-oriented classroom is to go back to basics, and to let life participate, experience, make dialogue, communicate, explore, moist, enrich and develop in itself. The practice states of life-oriented classroom are: reflecting value orientation of life; promoting democratic equality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highlighting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text; constructing smart teaching modes; going into students' life experience; promoting students' personal development; building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seeking dynamic generation of classroom and achieving common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Key words:** life-oriented classroom; value; connotation; practice state

## The Academic Life and Academic Contributions of Teng Dachun

He Guoqing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315211, China*)

**Abstract:** Teng Dachun is a famous scholar in history of foreign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He graduated from Peking University in 1933, and then worked in Shandong, Anhui and Sichuan consecutively. He went to USA to study in 1947, and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with a PhD in Education in 1950. Since his returning to China in 1950, Teng Dachun had taught and researched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of foreign education for half a century. As a recognized founder of history of foreign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Teng Dachun had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of foreign education and the research of American educational history and Western educational thoughts. He had trained more than a dozen of PhD candidates majored in history of foreign education. Teng Dachun's academic life is a precious legacy that is worth remembering.

**Key words:** Teng Dachun; history of foreign education; academic life; academic contributions